

## 浅论王粲的人格心态

杨立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在建安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人格心态的角度探讨王粲的创作风格,一方面,积极的用世精神和深重的忧患意识使他的诗歌不依傍经典,直抒胸臆,“发愀怆之词”;另一方面,浓重的客寓意识和“躁竞”而举棋不定的政治态度,加之身体先天的不足,共同导致王粲其人其诗的“自伤情多”、“文秀而质羸”,在某种意义上开了太康文学“情多气少”、悲而不壮的先声。

**[关键词]** 王粲 进取精神 忧患意识 客寓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9)11-0076-04

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在建安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他的个案研究也是建安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笔者以为,作为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的魏晋时期,对作家人格的研究应是研究这一时期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因此,本文以王粲的人格心态探索为基础,试对其创作风格形成的主体因素作初步的探索。

作为建安邨下文学集团的成员,王粲与其他作家一样,经历了汉末战乱之苦,而后在曹操麾下又激发了慷慨进取的热情。但由于特殊的家世和个体心理因素,王粲的人格也表现出极为独特的形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积极的用世精神

《三国志·王粲传》叙述王粲家世云:“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以疾免,卒于家。”豪门世家的家庭使王粲自幼就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从小就树立了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

景蜀慧先生指出,王粲在政治舞台上能积极用世是与王氏家族之学密不可分的,而“王氏家族之学乃是以五经为本,受到了汉代经学天人相通,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深刻影响”<sup>[1]</sup>。东汉末年,经学随政治一

道衰微,《三国志·魏志·王肃传》称“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出现了士人的思想信仰危机。随着士人思想的解放和个性的逐步觉醒,东汉旧士风瓦解,新的士风产生。王氏家族和东汉新士风的产生有着非同一般的渊源关系。王粲正是汉末魏初新兴士人的代表。他开始意识到经学章句的陈腐和虚伪,并走出封闭的书斋,对宇宙和人生进行冷峻的思索,选择自己生活的道路,重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他“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sup>[2]</sup>,其具体表现就是与时进取,希冀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登楼赋》中王粲抒发了“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的壮怀;归曹之后他多关注军国大事,虽然在《赠蔡子笃》中他发出了“悠悠世路,乱离多阻”的感叹,但他对功名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

建功扬名是王粲积极用世精神的核心内容。王粲在《咏史诗》中曾高喊要“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在《从军诗》其二中有言“弃余亲睦恩,输力竭忠贞”;在《行辞新福歌》中则云“自古立功,莫我弘大”。在《安身论》中他提出“无私”和“寡欲”：“盖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这种精神既是王粲个人道德修养的极则,又是他“兼济天下”的最高境界。怀着强烈的政

**[收稿日期]** 2009-07-21

**[作者简介]** 杨立群(1963-),女,安徽亳州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治进取心,王粲先投奔刘表,不得重用,也不忘立言,著《英雄记》,历叙当时驰骋中原或扬名诸侯的各类人才的事迹;继而依附曹操,典定朝仪,使曹魏朝仪制度影响后世。

王粲对功名的追求,可以从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中找到根源。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提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思想;贾谊《鵩鸟赋》赞美“烈士徇名”;司马迁《报任安书》称“立名者,行之极也”。而在王粲的同时代人中,作为政治决策者的曹操,在《龟虽寿》中表达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从《与杨德祖书》来看,权力斗争中失意的曹植也同样抱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情怀;建安七子也都怀着渴望建功立业的焦虑,如陈琳《游览》之二:“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可以说,在哀叹人生短促中努力提高生命的质量,展示自己生命的价值,获得精神上的不朽,正是建安时期人的自觉的集中表现。而豪门世家的出身,家族之学的熏陶使王粲的用世之心更加突出。

## 二、深重的忧患意识

王粲在表现积极用世精神的同时,心灵深处的那种深重的忧患意识也分明可见,其特征是身处乱世,对民生多艰的关注,对人生短促和壮志难酬的喟叹。具体表现在:

首先,动乱的社会给王粲心灵投上一层阴影,成为他忧患意识生发的外在因素。王粲生活在建安这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动荡时代,怀才不遇,奔波流离。因此,对大汉统一帝国的沦丧,他唏嘘流涕,不胜感伤,其代表作《七哀诗》中描绘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画面,正是现实社会的生动写照。王粲表现个人忧患意识的作品很多,其中以《登楼赋》最为著名。全篇以登楼“销忧”始,而以“心凄怆以感发”、“气交愤于胸臆”结束。登楼所见,皆为美景,然而“虽信美而非吾土”,反惹出满腹乡思来,一语道破作者当时的心境和忧国、忧民、忧己之感。

其次,建安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作家心灵的觉醒决定了“文的自觉”,这是王粲忧患意识生发的内在动力。忧患意识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王粲从小就受到经学致用思想的教育,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军诗》其

四:“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他渴望参与政治,建功立业,表现出拯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昂扬的进取精神。王粲先投刘表无望,后依附曹操,虽有所用,也仅是刀笔吏而已,与企望相差甚远,因此,正当他怀抱济世拯物之志步入社会时,却感到举步维艰。社会现实与个人志向的冲突,使他郁积强烈的愤慨、不平、痛苦和失望。人生短促与壮志难酬的悲哀紧紧缠绕着他,骚扰着他的灵魂,他忧伤不已,唱出了充满忧患的悲歌。《七哀诗》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再次,汉代以来,文人士大夫“尚悲”的审美文化心理是王粲生发忧患意识的催化剂。《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事,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也”,指出了建安文学“悲凉慷慨”的时代特色。“尚悲”的审美文化心理在西汉初已形成,枚乘《七哀诗》中用悲哀浸染出来的材料做成的琴,奏出非常悲哀的音乐,却能使卧病的太子强起而听之。王充《论衡·自纪篇》中,把“美色”和“佳肴”与“悲音”对举,认为音乐美感的最高标准是“悲”。“悲音”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悲音所激发出来的是对人生的深沉感慨和情感反思,从而感悟人生本体的意义。王粲在汉末乱世的旋流中沉浮,目睹了战争的残忍与血腥,看到了黎民的哀嚎与困苦,战乱纷扰的时代使生命充满着不安与困厄,他不仅身在漂泊,灵魂也无所指归,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朝不保夕,惶恐不安,对生命悲剧性的体验,加深了他的悲剧意识及对生命的理解,在他胸臆中形成了“尚悲”的审美心理机制。王粲的作品,不管是人生哀情的自我流露,还是深切的家国之忧,其中都跃动着—个敏感的极具悲悯情怀的诗人形象。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以及强调关注现实与务实精神是王粲忧患意识生发的历史根源。王氏家族学术乃是经世致用之学,它影响及于王粲,进一步加深了他因不得真正用世展才的心理失衡<sup>[3]</sup>。王粲积极用世之心越强烈,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就越大,对他心灵的创伤就越深重。他内心的郁闷牢骚、忧患感伤充斥于作品之中,《闲邪赋》《神女赋》《思友赋》《伤夭赋》就是代表。

王粲恨圣时之不遇,哀民生之多艰,愿与国共忧患,悲有志不得展。他的忧患意识既不同于庄子的

悲观出世,亦有别于《古诗十九首》的感伤消沉,具有鲜明的时代和个性特征——忧患与用世并驱。继汉以后,王粲在渐尚通脱的时代精神下,他的诗赋再现了世俗人生的悲欢哀乐,使诗歌的思想、情感更加生命化、本能化。其悲情的主题既有传统的济世、功业荣名意识,又扩展到对个体人生意义的焦虑和对普遍生存状态的关怀,使主题更加深刻,在屈骚之后又一次扩展了抒悲主题。

### 三、浓重的客寓意识

“客寓意识”出自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的《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他说:“纵观李白诗歌及生涯,我们深感他本质是‘旅人’,亦即行旅之人,他的诗本质上是旅人之诗,也即行旅之诗。这并不是说,他只像杜甫那样生涯大半在行旅中度过,而是以一言蔽之:他总为行旅之人,总有行旅之感,也即所谓的客寓意识,这是他诗思(或诗质)的中心内核。”和李白一样,王粲似乎也处于这种永远的行旅之中。

王粲出生时,大汉王朝已危如累卵。东汉初平元年(190年),王粲14岁时,东京暴乱,董卓焚烧洛阳宫室,挟持汉献帝和朝中官吏迁往西京长安。这一年,王粲随父亲从洛阳流徙长安,两年后,长安大乱,他被迫再度流徙,投奔荆州刘表。王粲投奔刘表不只是为了逃难,更是想依靠他实现自己的报国志。但刘表徒有虚名,嫌王粲体貌丑陋,不予重用。此时,王粲正是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青壮年。他为了避乱寻求一个稳定的用世场所,却被弃用,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最终只能停留在佐时思治的理想层面,寄人篱下,内心苦闷压抑,客寓意识也因此而发。

王粲在荆州寓居十年,却始终不能认同其地,客寓意识特别浓重。《七哀诗》其二:“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这些无不表达了他的客寓意识。

建安十三年(208年),王粲终于回到日夜萦怀的中原故土。一时颇为欢欣鼓舞,作《初征赋》云:“赖皇华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践周豫之末畿。野萧条而骋望,路周达而平夷。春风穆其和畅兮。庶卉焕以敷蕤。行中国之旧壤,实吾愿之所依。”虽然那时中原一带仍十分荒凉残破,但王粲的精神状态却空前振奋,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回归故土的兴奋之情,一条通往仕途的大道似乎就在眼

前。然而,曹操“奉行申商之术,对待士人的真正态度却决定了曹氏政权远非士大夫实现济世之志的理想场所”<sup>[4]</sup>。因此,王粲虽然官位很高,出入驷乘,但充当的只是“雍容侍从”的尴尬角色。《杂诗五首》之五:“鸢鸟化为鸿,远窜江汉边。遭遇风云会,托身鸾凤间。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闲。邂逅见逼迫,俯仰不得言。”这反映了他依附曹营,但言行并不自由的状态。王粲虽然肉体上回归了中原故土,但灵魂深处仍以“客子”自居,因此,《从军诗》在颂德之外,着重抒写的是征士们思家念亲的感情,以及这种感情与勤劳国事、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寒蝉在树鸣,鸛鹤摩天游。客子多悲伤,泪下不可收。”“回身赴床寝,此愁当告谁。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出门恋家之苦、在外望乡之痛,表达得淋漓尽致,似乎根本不存在可以回归的故乡。据此推理,王粲的这种客寓意识,并非仅是怀乡恋土,而是一种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忧郁情结。

“古代中国的基本生产方式是农耕,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农业为本,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资料自然被特别看重。祖先崇拜与落叶归根的丧葬意识,人不愿长离故土,因而对故土的亲和感顽强的延续。”<sup>[5]</sup>安土重迁,对故土的怀念已经成为浓厚的人文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代代相传。王符《潜夫论·实边》称:“安土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扬雄《连珠》也认为“安土乐业,民之乐也”。可见,“安土”将乡思、怀乡的文化心理一语道破。王粲是十足的儒学之士,他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再加上十六年寓居生活的真切体验,自然就会有更加浓烈的思乡之情和更加浓重的客寓意识。

王粲《登楼赋》:“路透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奎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易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就将客寓中的自我,无依无靠的自我,失落被遗弃的自我,放置在救国勤王的风口浪尖之上。追求——被遗弃——再追求——再度被遗弃是王粲的人生经历,因而他的客寓意识又有着相应沉重的内涵:投奔、落拓之感,投映报国济民之思。《仿连珠》中“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的焦虑,故乡难归、客寓荆州的飘泊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感和壮志理想无人

理解的孤独感,生命等闲虚度的失落感和时不待我的紧迫感,交织于胸,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客寓意识,希冀回归故乡,进而寻觅到一个能够抚慰自己孤独、苦闷、失落心灵的温暖而安全的“家”。王粲以其卓越的艺术表现力,对诗骚以来的传统怀乡母题进行拓展,他所作的思乡怀归的诗赋,表达了游子的一种普遍的情愫,因而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 四、举棋不定的政治态度

纵观建安七子的个性人格和各自的处世态度不难发现,王粲性格既没有孔融的刚直严正,也没有刘桢的洒脱无忌;既不像徐幹那样明哲保身,目睹主昏臣乱的政治现实而轻官忽禄,不耽世荣,也不似阮瑀能够以才自护。他的性格比较软弱,《三国志·魏志·杜袭传》中评王粲“性躁竞”,这种性格不免影响他在政治上的态度。王粲投奔刘表,作《三辅论》,借江滨逸老之口盛称刘表:“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履道怀智,休迹显光,洒扫群虏,艾拔秽荒”。歌功颂德,不无阿谀逢迎之嫌。归曹后,王粲对曹操也有不少赞美之辞。《从军诗》其一:“从军有苦乐,但闻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公讌诗》:“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但曹操对于王粲并未马上给予重用,因此,建安十三年(208年)以后的几年内,王粲并没有太多的政务可干。这时他作了《七释》,其中流露了他在“无为无欲”、“混齐荣辱”与“进德修业,与世同理”两种人生道路之前举棋不定、彷徨困惑的情绪。这是王粲未得重用深层心态的反映。

王粲遵奉儒家的穷达之论,穷则独善,达则兼济,但他的处境却始终处于穷达之间,壮志难酬,其举止行动也摇摆不定,或进或退。一遇困窘,便难免有慨世之叹,甚至生激流勇退之想。在《吊夷齐文》中,他感孤竹之二子“守圣人之清慨,要既死而不渝”。但这种悲并非仅仅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感于古,慨于己。王粲仕于曹,却要以夷齐为表符,这不仅曲折地反映了王粲当时的处境,而且也表明了他对曹操的态度,透露出他政治态度的复杂性。

总之,王粲独特的个性人格和不同于他人的际遇,决定了他不同于建安诸子的思想心态,而创作心

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定着他的创作倾向和审美追求。钟嵘《诗品》把王粲列为上品,说他“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云:“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从诗歌创作历程看,王粲前期“颠沛流离,无以家为,然其地位相对游离,人格亦较为独立,社会及个人忧患意识较浓”,因而优秀之作较多;“后期生活安定,地位亦高,对曹氏的依附关系或主从关系十分明确,所以应制之作较多,气骨相对较弱”<sup>[6]</sup>。但从总体上看,王粲的诗歌在“建安七子”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与大多数建安文士一样有着积极的慷慨进取精神和时代忧患意识,不依傍经典,往往直抒胸臆,直达所怀;另一方面,“貌寝体弱”的身体条件和浓厚的客寓意识,加之对仕途的“躁竞”,共同导致了其人其诗的“自伤情多”。羁旅之愁、思乡之忧以及命运无常、白首无为的凄怆,使王粲的诗赋虽没有壮烈的气势,但真实地写出了现实,抒发了自己的郁闷、伤悲,独具悲情之美。《诗品》指出潘岳、陆机、张协、张华、嵇康、陶渊明等20人的诗歌风格直接或间接源自王粲,说明王粲诗歌代表了一种风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曹刘间别构一体”的“仲宣体”开了太康文学“情多气少”、悲而不壮的先声。

#### [参考文献]

- [1][3]景蜀慧.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4.
- [4]景蜀慧.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0.
- [5]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401-402.
- [6]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13.

[责任编辑:邓双霜]